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战略演变的内在逻辑

文 / 何奇芮 (兰州大学 甘肃兰州 730000)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战略的演变发展是在实践的基础上沿着特定的理论逻辑展开前进的,其过程体现出高度的逻辑递进性和与时俱进的新特点。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导,坚持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坚持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同时深入参与全球治理,寻求建立更为有效的国际新秩序,坚持党的核心领导,是中国外交战略发展逻辑的基本特征。未来中国外交战略的发展,将在既有理论逻辑的指导下继续创新前行,实现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现代化。

关键词: 改革开放 外交战略演变 内在逻辑

历届领导人对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及其蕴含的外交理念都依据不同的时代背景要求进行了丰富和发展,取得的成果更是显而易见的。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国外交战略演变的过程和基本经验研究较多,对于其演变过程中的内在逻辑的研究成果较少,因此探析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战略演变的内在理论逻辑,深入阐释不同领导人时期外交策略之间的逻辑继承与发展关系,对于新时代下中国作出新的战略抉择和坚持理论导向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导

从中国外交战略的发展过程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外交战略的日新月异是在一定的思想理论体系指导下取得的,这种理论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邓小平在对外战略上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通过独立自主的调查、分析和研究,不断根据现实条件的变化,又依据不同现实的不同情况,调整自己的外交政策,以达到满足国家需要的目的。邓小平这一外交思想的特点就体现着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实事求是。

作为无产阶级政治家和战略家,江泽民为中国外交理论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他对于邓小平时代主题的判断进行了新的解读,提出了世界多极化趋势的新判断,创立了以互信、平等、互利、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等。所有这些理论和主张都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的外交思想,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和谐世界新理念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新时期中国对外政策目标的新总结。它也是中国对外工作和国际关系处理的新指南。这一理念既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外交传统的继承创新,又是客观分析国际形势和我国国际地位变化后的选择。从理论创新的学理视角来看,中国倡导建设和谐世界,首次就国际问题、战争与和平、人类前途命运等重大理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系统观点和理论框架,超越了传统的民族、国家甚至文化、文明视角,从而也就摒弃了现实主义冷战思维,实现了多方面的创新与超越。

习近平外交思想贯穿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体系结构完整,承上启下,极大地

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外交面临的复杂形势,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客观实际,对外交理论进行了新的时代解读和丰富发展,这些新主张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发展至今的新成就,还是继承创新历届中央领导集体国家战略思想在当下中国外交领域的新成果。

综上所述,当代中国的外交价值是在不断与时俱进的创新过程中,依据新的时代形势和新任务,推陈出新,就其自身基本原则和原理的基础上,通过不断调整更新,并通过一系列特定的实现路径,实现理论价值的不断超越,从而服务于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总目标。

二、始终坚持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外交政策

在新中国成立至今的发展历程中,中国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内容不断充实完善,同时,也表现出鲜明的时代性。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刚刚摆脱文革的阵痛,自身实力不强,急需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尤其是周边环境来支持国内经济建设,为此中国领导人开始用建设和发展思维来审视国际形势,外交上逐渐向满足国家发展需求的不结盟外交转变,具体表现为外交战略必须服从并服务于国内发展的目标,展现了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独立自主和平思想。

江泽民在新的时代任务要求下推动中国外交事业进一步发展。他在继承邓小平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世界多极化的合作进步趋势,推动与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安全等多领域的合作,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型安全观,进一步扩大与世界各国的合作渠道和合作水平,加深了与世界各国的相互了解,促进了中国对外开放事业的发展。

以胡锦涛为核心的领导集体提出的和谐世界理念内涵多元,不仅包含世界各国和平相处、共同发展的理论内核,也表达了期望达到世界各国和谐共处、相互依赖的融洽状态。和谐世界理念重视实现人类共同的政治、经济和其他利益,并描绘了人类共同利益实现的方向和努力途径。由

此可见,构建和谐世界需要更高的标准,这超越了战争与和平、和平与发展的思想和观念。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决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和民族尊严,并且划定了和平发展条件的边界,强调坚持不结盟、不干涉内政等原则。在坚持原则性的基础上,还体现了主动性的特点,从以往被动应对向积极争取主动转变,对国际体系的参与逐步深入,积极主动参与国际事务,在全球治理问题上不断贡献中国智慧。

在当代中国外交中,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外交原则在继承中推陈出新,在创新中逐利而行,与时俱进,在形式表达上更加鲜明、恰当,在内容、内涵上也更加丰富,也使这一思想境界不断升华,更加具有前瞻性和务实性。

三、始终坚持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国际定位从未改变,发展利益始终是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始终坚持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是中国发展至今的信条。

邓小平始终视发展利益为中国最现实和最长远的国家利益,从国家利益出发,邓小平指出了主权的不可侵犯性,针对解决国家领土争端问题,邓小平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思想,不仅维护了国家核心利益中最重要的主权和安全,而且牢牢把握经济发展的根本和长远利益,兼顾国家荣誉和尊严。

由邓小平开创,并被江泽民继承的韬光养晦外交则主要关注复杂国际环境下如何继续推动最核心的发展利益的实现,并且不伤害中国的其他利益。江泽民的国家利益观,顺应了时代的新发展,突破了西方传统的以邻为壑的现实主义国家利益观,创立了具有全球意识和全球理念的国家利益界定的新价值观念,将国家利益准则推向了世界。

胡锦涛的国家利益观关注的是在中国崛起越来越引起大国和周边疑虑的时候,如何维护国家安全,推动中国发展,并兼顾海外利益和国际声望等利益。与江泽民时期相比,胡锦涛的国家利益观在继承其全球意识的国家利益价值理念时,贴近了同世界各国的联系,注重国家与世界的双向互动中维护和争取国家利益,开创了我国外交的新局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的国家利益观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指导,以国家发展作为最核心的国家利益,谨慎处理大国和周边国家对国家安全核心利益的威胁,同时也要兼顾越来越重要的海外利益和国际威望。习近平时期的国家利益观更加体现出了在国际社会的有所作为。

在全球化日益繁盛的大背景下,中国的国家利益的复杂程度前所未有的,在这种情况下,当代中国外交更需要在汲取历史教训的基础上保持高度的理性和智慧,维护最核心的国家利益。

四、始终坚持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判断

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发展至今的逻辑起点,是中国外交战略制定的基础。经历四代领导

人的变迁,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基本判断没有改变,各领导人依据不同时期的独特性对其内涵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丰富发展。

20世纪70年代,面临复杂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邓小平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客观分析和判断国际形势,对国际形势和时代主题作出了新的理解即和平与发展。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是邓小平时期外交战略的逻辑起点,也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发展至今的逻辑起点。他对于时代主题的分析判断在今天也没有过时,仍然是中国外交战略制定的基础。

江泽民对于时代主题的把握基于他对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科学分析,基于邓小平时代主题思想的基础之上,他强调国际形势基本走向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并在世界和平、国家发展的基础上增加了人民合作、社会进步的时代新理解,使和平发展思想开始从单纯的国际形势判断向长期坚持的国家战略转变。

以胡锦涛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推进和升华了和平发展思想的价值取向,提出要推动世界持久和平、共同繁荣,建立公正、平等、共赢、多元的国际新秩序,将和平发展思想上升到国际层面。

面对21世纪世界正在经历的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习近平主席及时地提出了新的时代观和时代主题即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简称合作共赢时代观,时代主题便进入了从和平与发展向合作共赢的转换期。习近平这一新的时代观,不在局限于国内和平与发展,依托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和平发展思想升华为谋求世界和平与各国共同发展的国家战略和全球战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习近平的合作共赢时代观既具有指导现实的正确性,也具有引领未来的前瞻性。

中国政府越来越把和平发展由对国际形势发展基本趋势的判断转化为自己的长期国家战略和外交战略。十分清楚的是,当前中国和平发展战略内涵更加丰富,不仅包括国家发展所需的外部和平环境,也包含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各国共同繁荣的新理念。

五、始终寻求建立有效的国际新秩序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国际秩序观不断进行重大的变迁,其中既有始终如一坚持的原则和目标,又有求索不止的创新和超越。

首先,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内容不断完善和丰富。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主张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政治上强调国家之间交往跨越传统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峡谷,各国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经济上主张国际贸易互通有无、互利共赢。江泽民时期继承了邓小平时期的国际秩序理念,使之在经济、政治、文化与安全四个方面具体化,并在此基础上增加了推动世界国际化与经济全球化、树立新安全观的内容。胡锦涛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理念,在江泽民时期基础上添加了维护全球生态、共同保护

人类家园的生态层面,在经济、政治、文化、安全、生态五个方面对中国国际秩序观进行了丰富和发展。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提出构建新兴大国关系,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党的十九大上明确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等内容,内涵更加丰富,体系更加完备。纵观中国不同领导人时期主张的国际秩序观,是在随着中国参与国际事务、国际秩序构建的程度加深而不断丰富创新的。

其次,不同时期中国参与国际秩序构建的目标不同。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主张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更多是为国内发展服务。到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中国成为西方国家的新一轮攻击目标,因此安全就成为中国国际秩序观中的重中之重。随着中国经济腾飞,国家实力巨大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扩大,中国从世界舞台的边缘地带逐渐走近世界舞台中心。因此中国在参与国际事务时越来越重视自身的国际形象,逐步承担起一个大的国际责任,为国际社会贡献中国智慧,构建和谐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中国国际秩序观的新内容。

再次,中国国际秩序观的外延不断延伸,从强调国家间合作上升为全球秩序。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国际关系从传统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中跳脱出来,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融合程度愈来愈高的状态。国际关系的部分准则和行为规范已经不能约束和指导某些国际问题,当下建立更加公平正义的全球治理新秩序成为各国外交战略追求的新目标。

最后,改革开放以来,国际秩序观的内涵和外延得到不断的丰富和拓展。在其发展过程中,建立国际新秩序的目标呈现出公正合理的倾向。参与国际秩序的中国外交实践从服务自身发展逐步向承担大国责任转变,追求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秩序。回顾历史变迁,中国参与国际秩序不断的完善和发展。

六、始终坚持党的领导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旨在走出一条与传统大国不同的强国之路,而其根基所在便是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人从古至今,努力从“老路”和“邪路”中找到一条真正适合中国发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外交的成就,正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懈努力的结果。从不结盟政策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中国四代领导人的积极探索和奋斗。邓小平同志在坚持党的领导下提出不结盟政策,成为我国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逻辑起点,

由此独立自主和平发展道路得到一代代的传承和认同。在世界风云变幻之际,江泽民同志审时度势,面对诸多困难,稳固党的领导标杆,坚持韬光待晦的方针,中国外交工作在党的领导下稳步推进。胡锦涛同志继承以往外交思想,提出互利共赢的国际战略,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坚持党的领导,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将坚持党的领导作为最核心的依据,中国就如何处理对外关系、构建国际秩序、参与全球治理等议题提出自己的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际上不断推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树立新安全观、全球治理观等新内容相继出炉,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内涵,指明了新时代中国外交工作的方向。可见,党的领导在中国外交中发挥着核心领导作用。正是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我国外交工作才能戮力同心、齐心协力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在国际上立于不败之地。新形势下,中国外交将更加紧密地在党中央领导下,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念,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

正是坚持了党对外交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我国外交工作才能在几十年的实践中披荆斩棘、砥砺前行,取得不少历史性成就,在始终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基础上不断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历史和现实经验说明,党对外交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外交的鲜明特色,也是中国外交能够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根本保障,必须作为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始终得到继承和坚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战略具有一以贯之的内在逻辑,在国际形势判断、理论基础、基本原则、底线、目标追求、领导层面等既保持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原则的延续性,也呈现出与时俱进的新特点,体现出延续性和发展性的有机统一。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 [2]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3] 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2001)[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
- [4] 当代中国外交(第二版)[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 [5]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12-19
- [6] 齐鹏飞.改革开放40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发展历程和基本经验[J].学海,2019(1).